

《法顯傳》考證

「日」足立喜六 著
何建民 張小柳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貴州大學出版社

《法顯傳》考證

〔日〕足立喜六 著
何建民 張小柳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法顯傳》考證 / （日）足立六喜著；何健民，張
小柳譯。——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4.2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75-7

I. ①法… II. ①足… ②何… ③張… III. ①《法顯
傳》—研究 IV. ①B94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030771號

《法顯傳》考證

著者：〔日〕足立喜六

譯者：何建明 張小柳

責任編輯：滕 芸

出版發行：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刷：貴州創興彩印廠

開本：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張：8.25

字數：197千

版次：2014年3月 第1版

印次：2014年3月 第1次印刷

書號：ISBN 978-7-81126-675-7

定價：60.00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0851-5981027

本書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爲 2013 年貴州省新聞出版局重點圖書，
并獲貴州省出版發展專項資金資助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為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為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西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為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西元之初，佛教並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西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蘊。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率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法一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爲我們的冒昧致歉，並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本冊說明

《法顯傳》，全一卷。又稱高僧法顯傳、佛國記、歷游天竺記傳、高僧傳，收於大正藏第五十一冊。乃東晉高僧法顯經西域至印度諸國求法過程之記錄，為我國僧侶旅行印度記傳中現存最古之典籍。本傳與唐玄奘之大唐西域記、義淨之南海寄歸內法傳，為中古歷史、地理之重要史料。

《〈法顯傳〉考證》一書是日本人足立喜六著，何建民、張小柳二人合譯的，該書對於原法顯傳的原典有最詳盡之校訂。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序說，下編校釋。上編序說分五節，對於沙門法顯之略傳、法顯之印度游歷記、大藏經與法顯傳、佛國記、法顯傳之考證五個方面進行序說；下編校釋則分四節：由長安發迹至西域之旅程、北天竺與西天竺、歷訪中天竺佛迹與東天竺、經由錫蘭島及南海而歸還，另附有法顯自長安發迹至張掖鎮圖、自張掖鎮至夷國圖、葱嶺及北西印度圖，附錫蘭島中印度東印度佛迹歷訪地圖，附王舍城附近印度洋及中國海海流及季節候風（冬期夏期）、法顯上陸地圖數圖以供參考。

石田氏序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譯經宣教，初皆爲西土東來之諸大德所擔任，六朝以降，中國已不滿足於此，故進而欲至五天竺地，親求法寶者，相望於道。劉宋、法顯實肇其端，嗣雖有宋雲、慧生、智猛、悟空等人相繼西征求法，然能與三百年後，唐之玄奘及義淨相提并論者，則法顯氏一人耳。顯以晉隆安三年（三九九年），發跡長安，度流沙，踰葱嶺，過五河之地，徧歷恒河流域，涉聖教之本地，廣尋佛蹟，復泛海游獅子國，漂流海上，歷時甚久，最後經由南海諸島，義熙九年（四一三年）始還京都建康。《法顯傳》一名《佛國記》，乃錄其所至諸國之見聞，文辭簡潔，而能握其真象，得其要略，所叙中亞、印度與南海之地理、風俗及信仰等，歷歷如指諸掌；不獨爲今日漢學及佛學之重要資料，且係東方學之貴重資料，其見重於世界學術界，更不待言也。

惟是書之研究，與宋雲、慧生、悟空、玄奘等之《渡天行記》，反均由西方學者着其先鞭，而東方學者，則尚未有予以充分之檢討與考究。十九世紀之初，法國 Abel-Rémusat 氏先有法譯（一八三六年 Klaproth 及 Landresse 兩氏共刊《佛國記》）。次由英國 Beal 氏重譯爲英文（一八六九年）刊《法顯及宋雲之行記》，後收於《西域記叙說》。又英人 Giles 氏慨前二書謬誤之多，又復重譯（一八七七年刊《佛國記》）。嗣英人 Legge 氏不嫌重複，乃另加譯註（一八八六

年刊《佛國記》），對於前人之業績，大加改訂，然終爲 Giles 氏所反對，Giles 氏遂廢其舊譯，而另有新版之《法顯傳》（一九二三年《法顯行記》）刊世。是此書也，大有獨爲泰西學界寵兒之概。反之，其在東方，則僅收藏於歷代藏經之中，未絕流傳，明末以後，只有二三叢書刊刻，其言研究，殆未之見。迄最近，中國岑仲勉氏始撰有簡略之註釋，而在日本，亦有少壯新進之學者，相率加以研鑽，雖嫌其晚，然亦可喜之現象也。

惟西方人士之研究，雖費多數人之努力，然其根本則皆有一大弱點在。彼輩對於正文校勘，不甚注重，故其譯本，訛謬誤層見叠出，雖自誇爲正譯者猶不免多所舛誤，誠以顯書行文簡淨，釋讀困難，而正文又多譌脫，亦難怪其然耳。蓋研究古書，應先從正文之校訂着手，是爲學問之常道；在日本，足資校訂此書之古寫本及古刊本甚完備，以是吾人不能徒賴西方學者之業績，以了其事。必須進而利用此等資料，考其準確之正本。研究與考證，皆宜準此。在此意義上，足立氏之《〈法顯傳〉考證》實符斯旨，誠學界可喜之貢獻也。

足立氏者非僅一東方學專家，非僅一佛教學者，而實爲學界之居士，在家之篤學者。前撰有《長安史蹟之研究》（東洋文庫論叢第二十）一書，其裨益史界不少，爾來老而益壯，攻學之精神，凌駕青年學者之上，筆硯一新，茲復發表年來精研之鉅著《〈法顯傳〉考證》。蓋學問之領域，浩如烟海，問題之多，猶如恒河中之沙，難以備數。真勤於學者，乃真知學之匪易。學問非一人一家所能獨善，固已無庸贅言。故學問非專家所能專有，非有篤學之士，出而助之，雖爲專家，亦難期其大成。吾人鑒於泰西東方學者常借助於宣教師及外交官，而獲偉大之成績，此種感想，在日本尤深。在此意義

上，足立氏之新著，實可歡迎，其功績之大部固在正文之校勘，然其註釋中，可稱為創見者，為數亦不少也。倘因是而引起學界繼起研究，則學界之幸，莫甚於此。後輩如余，為前輩著者作序，實覺僭妄，惟因諸種宿緣，不克固辭，爰書蕪詞，以代介紹。

昭和十年十一月中浣

石田幹之助 識

著者序

本書雖題爲《〈法顯傳〉考證》，然亦可稱爲《〈佛國記〉之基本的研究》。《佛國記》爲一千五百年前之實地考察的記錄，凡關於中央亞細亞、印度、南海諸地之地理、風俗及宗教等，實以本書爲根本的資料，故其價值，早爲斯界所共認；至其年代與事實之正確及記述之簡潔與明快，亦遠出於《大唐西域記》之上。故中國歷代將本書編入《大藏經》中至明朝振亨以後，有收入叢書中，以行世者，如清李光廷氏，著《漢西域圖考》時，曾採爲重要之資料，近人岑仲勉氏研究此書，而著有《佛游天竺記考釋》一書。至西方學者，夙已承認《佛國記》之價值：一八三六年 Klaproth 氏及 Landresse 氏出版 Abel-Rémusat 氏非常努力所完成之法釋本；一八六九年 The Rev. S. Beal 氏刊印英譯本；一八七七年 Herbert H. Giles 氏更加以訂正及增補，而另出新英譯本。一九二二年 Giles 氏重行校訂前書，並參以 Chavannes, Stein 諸氏之研究，改譯、另刊。此外，尚有許多翻譯及研究之學者，而以西域探險家及印度佛蹟調查者，尤爲重視，大有必攜之指南針之概。

上述之諸研究，雖費多大之努力，然對原文之釋讀，有頗感困難之形迹，且其附註 (Notes)，亦多謬誤。實因諸書，咸以高麗版《大藏經》，元、明版《大藏經》中所收之《法顯傳》，或以《津逮秘書》以後之《佛國記》爲底本，而英譯者對原文之釋讀，亦不容易，而其